

从“势利”到“杂食”？

——中国城市居民文化品味的变迁(1999—2023)

李东雨

内容提要:文化杂食是文化社会学研究探讨文化品味与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重要概念。西方社会精英的品味模式从“势利”到“杂食”的历史转变是早期文化杂食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但既有研究相对忽视了文化杂食现象的变迁。本文以音乐品味为例,考察了1999年至2023年中国城市居民文化杂食的基本情况,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杂食水平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稳步提升。与西方社会从“势利”到“杂食”的转变过程不同,这一改变更有可能是我国社会各阶层获得更多文化消费选择、文化品味变得多样化的结果。

关键词:文化杂食;文化品味;音乐品味;杂食者

文化品味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彼得森及其合作者(Peterson & Simkus, 1992; Peterson, 1992; Peterson & Kern, 1996)在一系列研究中提出了文化杂食(cultural omnivorousness)的概念,用以描述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文化品味模式。他们发现,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倾向于同时欣赏高雅和传统上被认为通俗的文化艺术形式,表现出杂食者(omnivores)的品味模式。而社会地位较低的公众则更有可能成为只喜欢少数文化艺术形式的单食者(univores)。大量经验证据为文化杂食现象提供了支持(Chan & Goldthorpe, 2006, 2007; Katz-Gerro, 2002; López-Sintas & García-Álvarez, 2002, 2004; Purhonen et al., 2010; Van Eijck, 2001; Warde & Gayo-Cal, 2009)。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文化杂食

作者简介:李东雨,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计算社会科学。感谢胡安宁老师提供的数据支持。本文曾在湖畔社会学青年沙龙报告,感谢程诚老师、陈忱老师和其他与会学者的宝贵建议,感谢于佳媛老师和王建老师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社会团结的文化基础研究”(22VRC140)。

的概念挑战了布迪厄(Bourdieu, 1984)的文化品味理论(Coulangeon & Lemel, 2007; Purhonen et al., 2011)。也有学者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文化杂食并未构成对布迪厄的挑战(Lizardo & Skiles, 2012),也不能概括现实世界中个体的文化品味模式(Atkinson, 2011; Jarness & Friedman, 2017),甚至可以说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人为构造物(methodological artifact)(Brisson, 2019)。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文化杂食无疑已经成为当前讨论社会地位和文化品味之间的重要概念(Warde et al., 2008)。

彼得森等人的文化杂食概念以及他们所批判的布迪厄的理论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Du, 2022; Li, 2021; Meuleman & Savage, 2013),相关实证研究也局限在西方社会(Hazır & Warde, 2016)。少量研究虽然涉及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中的文化杂食现象(李煜, 2001; 于佳媛, 2017; 朱迪, 2017; Du, 2022),但仍局限于截面分析,相对忽视了文化品味模式的变迁。然而,文化杂食现象的出现和历时变化恰恰是早期文化杂食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Ma, 2021; Peterson & Kern, 1996; Rossman & Peterson, 2015),西方社会上层的品味模式从势利(snob)转向杂食也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逐步转向开放宽容的体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的转型和变迁,一些学者认为,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文化分层出现的基础,我国中上阶层已经从“暴发户(parvenu)”式的品味转向了“高雅”品味,发展出独特的精英品味文化(Li, 2021)。在此背景下,理解居民文化品味特别是杂食口味的历史变迁以及促使这种转变发生的社会过程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将在简要回顾文化杂食的概念及其相关论争的基础上,以1999—2023年中国城市居民的音乐品味为例,对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杂食现象展开经验分析,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杂食水平呈现出怎样的变化?(2)是什么促使了这种变化发生?(3)与西方社会的文化杂食转向相比,上述变化过程有何不同?

一、文化杂食:概念溯源与理论争辩

文化品味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韦伯(Weber, 1948)和凡勃伦(Veblen, 2007[1899])等古典社会学家已经注意

到艺术欣赏和闲暇生活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此后,布迪厄(Bourdieu, 1984)对文化品味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他认为,人们根据他们所拥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而在社会空间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资本的总量、构成和轨迹三个维度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机遇(Bourdieu & Wacquant, 1992:99),这些机遇通过产生一系列经验而形成惯习(habitus)。惯习是个体长期占据社会空间中某一位置的结果,其外化的产物便是生活风格和品味。由于社会上层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对形式而非功能的需求,偏好抽象和复杂的消遣活动;社会下层则倾向于追求生活必需品,选择功能性和实用性较强的物品。通过这些生活风格和品味,不同社会阶层制造、强化并维持彼此间的区隔和边界,进一步彰显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高下之分。在所有文化形式中,布迪厄特别强调,没有什么“比音乐品味更能清楚地确证一个人的‘阶层’,更能准确地将一个人分类”(Bourdieu, 1984:18)。通过对大规模调查的经验分析,布迪厄发现法国社会在高雅和通俗品味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区隔,社会上层通常喜好抽象晦涩的古典音乐,排斥通俗音乐,较低阶层则偏好简单重复和商业化的音乐类型。

尽管布迪厄的文化品味理论得到了认可,但一些学者仍观察到了不一致的经验现象。迪马乔等人就发现,虽然高雅艺术消费似乎更多是和较高社会阶层相关联,但通俗、流行的艺术形式受到各阶层人群的广泛喜爱(DiMaggio & Useem, 1978)。彼得森等学者据此提出了文化杂食的概念(Peterson & Simkus, 1992; Peterson, 1992)。起初,彼得森等人关注的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品味。他们发现美国社会上层并不是只喜欢高雅艺术、附庸风雅的势利者(snobs),而是雅俗共赏的杂食者;而社会下层更适合被描述为单食者,他们以较单一的文化品味来凸显身份认同。基于此,他们认为良好品味的标准已经从只欣赏高雅艺术转变为同时喜爱高雅艺术和其他独特美学形式(Peterson & Simkus, 1992:169-170)。

然而,在后续研究中,彼得森对文化杂食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这或多或少引发了有关文化杂食概念的争论。在一项研究中,彼得森等人把分析单位转为品味群体,并认为在高雅文化的欣赏者(highbrows,即喜欢古典音乐或歌剧的观众)中,雅俗共赏的杂食者正在取代只喜欢高雅艺术、附庸风雅的势利者;而通俗文化的欣赏者(lowbrows)则是品味单一的单食者群体(Peterson & Kern, 1996)。一些学者批评彼得森对高雅和非高雅音乐欣赏者

的区分导致其偏离了对社会地位和文化品味之间关系的讨论,且在经验分析中对比的是样本量差异较大的两个子群体(Brisson, 2019)。或许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不足,彼得森等人进一步将文化品味的层级(hierarchy)和广度(breadth)视作两个不同且彼此独立的维度(Peterson, 2005; Peterson & Rossman, 2007)。将这两个维度交叉,实际上可以得到四类品味群体(高雅势利者、高雅杂食者、通俗单食者和通俗杂食者)。这意味着在通俗文化的欣赏者中,同样有广泛涉猎多种通俗文化形式的杂食者。在仅考虑品味广度的前提下,彼得森等人甚至进一步采取了计数法来测量文化杂食,仅考虑受访者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而不关注其喜欢的音乐类型是否跨越了高雅-通俗层级(Rossman & Peterson, 2015)。这也引发了有关文化杂食量(volume)的定义和构成(composition)的定义之争论(De Vries & Reeves, 2022; Nault et al., 2021; Robette & Roueff, 2014; Warde et al., 2007; Warde & Gayo-Cal, 2009),即文化杂食的测量是否需要考虑其原始定义中不同文化类型的层级取向。

彼得森等人多变的文化杂食定义、分析单位和操作化测量为这一概念带来了许多争议。而围绕文化杂食的理论定位问题,也即文化杂食与布迪厄文化品味理论之间的关系,学界更是出现了对立论(Chan & Goldthorpe, 2006, 2007)和统一论(De Vries & Reeves, 2022; Holt, 1997; Lizardo & Skiles, 2012)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在概念意涵和理论定位之外,文化杂食的概念还因其隐含假设而饱受批评。不难发现,在原始或者说构成的定义中,杂食者同时欣赏高雅和通俗的文化类型。这就自然牵扯出如何界定“高雅艺术”、如何衡量各种文化类型“合法性”高低的问题。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认为,文化类型之间的雅俗区隔和合法性高低并不是由其本身的固有属性所决定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文化类型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规范和评价,国家、教育系统、评论家、文化生产组织、艺术家和大众评价与认可特定的文化类型,赋予了文化类型合法性(Bourdieu, 1996)。因此,研究者需要从社会评价与认可中寻找判断各类艺术形式合法性高低的依据。然而,既有研究往往采用内生(endogenous)方法来测量文化类型的合法性(Brisson, 2019; Nault et al., 2021)。例如采取数据驱动的方式,依据研究数据中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品味的关系来构建文化类型的合法性等级(Robette & Roueff, 2014)。但这一方面依赖于社会

经济地位和文化品味的同构(homology)假设(Nault et al., 2021),另一方面则会造成同义反复的问题:如果高雅艺术是根据它们与较高社会阶层的关联所确定,那么较高阶层当然更有可能欣赏高雅艺术,进而也更有可能成为同时欣赏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的杂食者。还有学者依靠个人经验或常识来对文化类型的合法性进行排序,但这同样是内生方法(Hazır & Warde, 2016)。鉴于此,学者们呼吁要在文化杂食研究中使用不依赖于研究数据或研究者的外生(exogenous)方法来测量文化类型的合法性(Brisson, 2019; Nault et al., 2021)。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文化杂食研究的出发点是文化品味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但彼得森等人有关杂食取向历史趋势的判断也是文化杂食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Peterson & Kern, 1996; Peterson, 2005; Rossman & Peterson, 2015)。在彼得森看来,精英品味从势利转向杂食、杂食者逐步取代势利者是历史趋势(Peterson & Kern, 1996),表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逐步转向文化多元主义,社会更加开放包容,强调开放、包容和宽容的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价值观逐渐成为主流(Peterson, 2005)。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一趋势描述恰恰是对布迪厄相对静态的文化品味理论的最大发展(Reeves, 2016)。不过,这一判断却遭到了后续研究的质疑。学者们认为,文化杂食的兴起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在1982年至2008年间,美国社会较高阶层的文化杂食水平实际呈倒U形趋势(Brisson, 2019; Peterson & Rossman, 2007; Rossman & Peterson, 2015)。这可能是由历次调查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变化所导致(Brisson, 2019; Peterson, 2005; Rossman & Peterson, 2015)。加上拥有杂食品味的居民在历次调查中都不占主流,断言文化杂食将取代高雅势利似乎还为时过早(Brisson, 2019)。或许是出于上述原因,文化杂食的历史趋势这一早期杂食研究的重要论题被后续研究忽视:“一个最初非常关注变迁、试图使用研究方法展现这一维度的概念最终竟与纵贯分析(longitudinal analysis)脱节……被视作存在于特定时刻的一种文化品味模式……人们忘记了这个概念是为了描述一种假设的历史趋势而被创造的”(Gayo, 2016: 108)。直到近期,这一话题才重新得到关注(Lizardo & Skiles, 2015; Ma, 2021; Reeves, 2016)。

尽管文化杂食的概念面临诸多质疑,但如果将这一概念视作一种可能的文化品味模式,对它的讨论仍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学界对社会地位与文化品味之间关系的理解。在高雅势利的形象外,文化杂食的概念为我们呈

现了一个品味多元和包容的上层社会群体,表明社会地位和文化品味之间或许不是简单的同构关系。无论是杂食还是后续质性研究中描绘的更为丰富的文化品味模式(Atkinson, 2011; Jarness & Friedman, 2017; Warde et al., 2007),都说明个体的文化品味可能是复杂的组合。因此,探讨文化杂食等文化品味模式的变迁,将有助于学界理解基于文化品味模式的社会排斥是否发生了变化。

二、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杂食

国内学者发现,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的文化品味和实践存在显著差异。教育和职业阶层与喜欢古典音乐等高雅文化资本紧密关联,但这并不能解释居民文化资本多样性的差异(李煜, 2001)。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居民更有可能阅读书籍,看电影和电视的时间更短(林晓珊, 2017),也更多参加现场演出等发展型文化活动(范国周、张敦福, 2019)。一些研究也关注到了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杂食现象。朱迪(2017)考察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特大城市,发现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较高的居民在音乐和阅读品味上更倾向于杂食。于佳媛(2017)对上海中心城区女性广场舞群体进行了研究,指出教育是影响受访者是否喜欢高雅音乐类型的主要因素,而在高雅音乐欣赏者内部,职业地位是决定其杂食与否的关键因素。还有学者对文化杂食的概念及相关争论进行了梳理(卢文超, 2021; 孙宇凡, 2022)。上述研究从中国经验出发,丰富了学界对文化杂食的认识。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大多仍关注某个特定时间截面上的文化品味现象,相对缺乏对文化品味历时变迁的考察。这或许是因为针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品味调查还较为欠缺。尽管在已知的大型社会调查中,涉及居民文化消费和休闲活动的题项已经较为丰富,但对居民文化品味和偏好的考察却仍然少见。此外,这些调查还面临测量题器不统一而导致的跨时段不可比问题。经验资料的缺乏使得探讨中国社会文化杂食现象的变迁面临巨大困难。

更为重要的是,围绕文化杂食现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还留下了一些有待阐明的议题。例如,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较为明确的“高雅”文化?如何测量各种文化类型的“高雅”程度?文化杂食的概念依赖于对文化类型“高雅”程度或合法性的判断,这意味着特定社会中至少要存在一种合法化的文

化类型,以形成高雅-通俗的区隔。西方社会中有明确的合法化文化,即神圣的古典传统(Li, 2021)。然而,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社会转型,这为形成统一的、长期延续的“高雅文化”制造了障碍。一方面,急剧的社会转型使文化类型的合法性不断变动,阶层化的文化品味模式无法生成。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戏曲和西方古典音乐一度被视为“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或遭禁演,或被改造和重构(盖格尔, 2013; 朱迪, 2017)。另一方面,相对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以及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经济精英文化禀赋的不足也使合法化文化品味的纵向代际传递发生了断裂(Li, 2021)。有学者就发现,年轻一代大学生的音乐消费实践更多源自同辈群体和互联网的横向分享,往往不与父辈的社会阶层相对应(王宁, 2017)。故而,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一种统一的、长期延续的、具有合法性的“高雅文化”仍然值得怀疑(胡安宁, 2017)。而如果中国社会并未形成稳定的高雅文化,文化杂食自然也无从谈起。如何测量中国社会中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合法性差异,以确证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已经出现了高雅与通俗的区隔成为关键问题。

如前所述,文化类型的合法性应当使用外生方法测量。受有关文化维度(cultural dimensions)的研究的启发(Kozlowski et al., 2019),本文认为研究者或许可以使用词向量(word embedding)方法外生地构建文化类型合法性的指标。词向量是一种把维数为语料库中所有词汇数量的高维空间嵌入一个低维连续向量空间中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转换,每个词汇都会被映射为实数域上的向量。词汇和向量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向量中的维度代表了词汇在某一特定维度上的隐含语义。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计算两个词向量之间的夹角来计算他们在语义上的接近性。譬如,古典音乐在多大程度上与“高雅艺术”相接近。通过使用不同时间段的语料库,词向量方法还可以展现某一文化类型合法性的历史变化。该方法有助于分析特定文化类型合法性的历史变迁,也特别适用于文化类型合法性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

更进一步,不同社会的文化杂食转向可能源于不同的社会过程,即文化杂食转向的发生可能是不同社会阶层杂食程度变化、不同音乐类型受欢迎程度改变的结果^①。彼得森认为,美国社会文化杂食水平的提升是社会较高阶层变得更为开放包容,从势利转向杂食的结果,他们不再局限于欣赏古典

^①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这一可能性。

音乐和歌剧等高雅艺术,开始接受更多通俗的艺术类型,如摇滚乐和乡村音乐等(Peterson, 1992; Peterson & Kern, 1996)。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杂食取向与开放宽容的价值观念相关联,彼得森的观点实际上赋予了较高社会阶层更为正面的形象,容易变为对上层杂食者的认可,使文化杂食成为新的、更受欢迎的合法性规范与社会地位标识(Robette & Roueff, 2014)。尽管后续研究大多未能支持彼得森对杂食取向历史趋势的判断,但仍多从社会较高阶层音乐品味的变化出发,对杂食取向的变迁做出解释。

然而,全社会杂食水平的提升并不一定是社会较高阶层在文化上变得更加开放包容、从势利转向杂食的结果。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社会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都获得了更多文化消费选择,文化品味变得更加丰富,成为文化杂食者。有研究就发现,法国社会杂食程度的增加可能源于音乐消费方式的多样化。随着随身听、MP3、手机和网络音乐平台的普及,法国各社会阶层的音乐消费都有所增加,从不听音乐的居民迅速减少。法国香颂等“中端”(middlebrow)音乐类型在这一过程中最为受益,听众大量增加。因而,法国社会杂食水平的提升或许只是反映了全社会通俗音乐类型消费的增长,而不是社会上层变得更为开放和包容(Robette & Roueff, 2014)。

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转型过程或许会使居民文化杂食水平的变化遵循类似的路径。如前所述,在国内,古典音乐、传统戏曲等音乐类型曾长期面临演出限制,但在改革开放后,二者都得到了快速恢复。一方面,中西方音乐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古典音乐团体重新来华演出,很快吸引了大量年轻听众。另一方面,古典音乐再次被纳入教育体系,培养了大众的兴趣和欣赏能力,以及一批古典音乐人才(盖格尔, 2013)。传统戏曲界也一直在积极探索创新的创作与传播方式,适应新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在通俗流行音乐方面,虽然港台流行音乐一度被视为“靡靡之音”,但随着官方态度的转变,各类流行音乐迅速收获了人们的喜爱。在长期缺乏统一的合法化高雅文化(胡安宁, 2017, 2021; 朱迪, 2017; Li, 2021)的历史背景和现代化与全球化交织的社会转型过程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居民的音乐消费选择迅速从相对匮乏变得丰富多样。可以预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音乐消费在这一过程中都会有所增加,音乐品味也会变得更为多样,各种音乐类型或许都会在这一时期收获更多听众,中国社会文化杂食水平的变化及其过程也将呈现出

不同于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特点。

三、数据、测量和分析策略

(一)数据

本文将1999年的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调查、200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2023年的当代居民文化价值观念调查的三份截面数据拼成一份时间跨度为1999年至2023年的合并数据(pooled data)以展开分析。尽管这三次截面调查有不同的抽样框、抽样方案和执行机构,音乐品味的测量题器也存在微小差异,但鉴于当前国内大型社会调查对文化品味的关注不多,早期调查数据更是不易获得,本文依然将三份数据合并以开展分析。上述局限意味着本文的结果仅仅是探索性的,对相关结论的外推也应十分谨慎。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受数据限制,本文无意也无法对文化杂食现象的所有争辩进行回应,仅就数据可以支撑的内容对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杂食现象进行初步分析并回应部分争论。

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调查由谢宇教授和潘忠党教授主持,采用两阶段概率抽样方法,在上海、武汉和西安三个城市各抽取50个社区、1300户家庭进行访问,最终回收的有效样本量为4444人。CGSS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实施,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方法抽样,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CGSS2008的有效样本量为6000人,但涉及受访者音乐品味的部分属于选答模块,只有3010位受访者回答了相关问题。当代居民文化价值观念调查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主持实施,采用配额抽样法,以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结果为配额依据,对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进行交叉控制配额,使受访者在上述属性上的分布接近全体中国居民,与本文的研究总体具有表面一致性。调查采用线上填答问卷的方式展开,通过行为数据验证、内部矛盾点验证和注意力检测题筛查等方式进行质量控制。由于1999年调查仅对城市居民进行访问,本文仅保留三份数据的城市居民样本。此外,由于研究者在2023年调查的音乐品味模块开展了问卷实验,为避免实验组音乐品味题器的不同而导致偏误,本文仅保留控制组的样本(控制组音乐品味题器与1999年和2008年调查基本一致)。由于实验分组是通过随机化的方式确定,实验组和控制组受访者在社会-人口学特征上

并无显著差异,且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属性的分布均与七普结果相近。在剔除关键变量有缺失值的受访者后,最终的样本量为6619人。其中,1999年4066人,2008年1864人,2023年689人。

(二)测量和分析策略

1. 文化杂食

文化杂食的概念在彼得森等人的研究中多次变化,既有研究对这一概念的操作化测量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所有从音乐品味出发的文化杂食测量都基于受访者对具体音乐类型的喜好。幸运的是,上述三次调查均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测量了受访者对一些音乐类型的偏好,选项从“非常不喜欢”到“非常喜欢”共5个等级,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其中三种跨年可比的音乐类型是:西方古典音乐(1999年表述为“西方古典音乐”,2008年和2023年为“西方的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和中国传统戏曲(1999年和2008年表述为“本国的传统戏曲”,2023年为“中国的传统戏曲”)。^①

测量文化杂食的第一步涉及对各种文化类型合法性的评估。本文将初步尝试使用词向量方法扩展文化类型合法性的测量手段。具体来说,本文使用1995—2023年《人民日报》语料库分年度训练词向量模型。随后,分别计算每一年度中“交响乐”“流行音乐”“戏曲”^②三个词汇与“高雅”“艺术”“通俗”“低俗”四个词汇的语义相似度。在对音乐类型与“通俗”“低俗”的语义相似度反向取值后,分别计算音乐类型与四个合法性词汇的语义相似度的平均值,以此刻画在官方语汇中,上述三种音乐类型的合法化程度。为避免偶然因素造成的波动,本文以一音乐类型在特定年份及其前四年(共计五年)中的合法性得分平均值作为该音乐类型当年最终的合法性得分,结果如图1所示。

^① 此外,1999年调查还涉及受访者对“民乐”和“五六十年代的歌曲”的偏好程度,2008年调查还包括“爵士/蓝调”和“摇滚”等音乐类型,但因为不可跨年比较,本文在此舍去。

^② 由于“古典音乐”一词并未出现在所有年度的《人民日报》语料库中,本文使用“交响乐”一词来近似地替代西方古典音乐这一音乐类型。当然,交响乐并不能完全代表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类似的,由于“传统戏曲”一词并未出现在《人民日报》语料库中,本文使用“戏曲”一词做了替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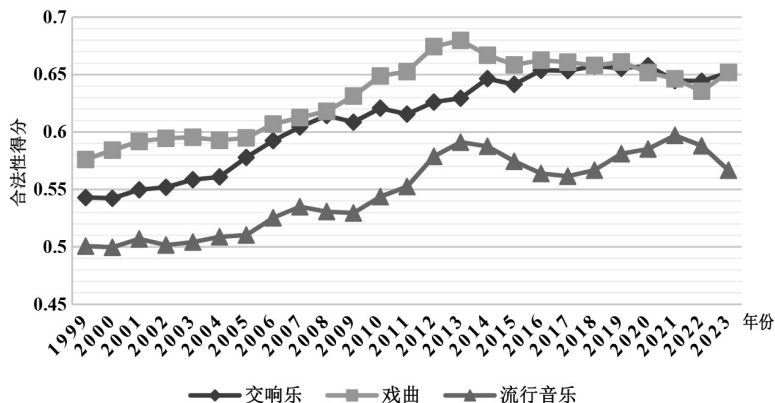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人民日报》语料库计算的音樂类型合法性得分

不难看出,在使用外生方法的情况下,不同音乐类型间确实存在合法性程度的差异。至少在官方话语中,不同文化类型间已经形成了高雅-通俗区隔。令人意外的是,在官方语汇中,传统戏曲似乎是更具合法性的音乐类型。交响乐的合法性得分则一直略低于传统戏曲,但在近年有明显上升趋势。流行音乐的得分一直低于前两者,反映其在官方话语中与“通俗”“低俗”更为接近,而与“高雅”“艺术”相去甚远。基于此,本文将“中国传统戏曲”视作本土高雅文化,将“西方古典音乐”视作海外高雅文化,“流行音乐”则视作通俗大众文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中国传统戏曲”视作一个统一类型更多是受限于数据可用性,未能顾及其内部差异。^①

文化杂食测量的第二步涉及受访者对不同合法化程度的音乐类型的偏好。本文将回答“非常喜欢”和“喜欢”某种音乐类型视作喜爱该音乐类型,编码为1,选择其他选项编码为0。受限于数据可用性,本文仅能考察受访者音乐品味的简单组合,受访者音乐偏好的所有可能组合如表1所示。首先是三种音乐类型都不喜欢的文化疏离者。随后是只喜欢流行音乐/传统戏曲/古典音乐的三类人群,分别命名为通俗品味者、本土高雅单食者和海外高雅

^① 艺术界对京剧、昆曲和地方戏等戏曲类型“艺术性”的看法迥然不同,不同戏曲类型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区隔”,故对相关结果的解读应当更为谨慎。此外,语料库的特殊性使得这一结果更多反映的是官方对不同音乐类型的态度。如果后续研究希望考虑评论界和艺术家对不同音乐类型的观点,或许还需要建立相关的语料库。

单食者。喜欢传统戏曲和古典音乐的群体命名为高雅单食者。音乐偏好跨越了高雅-通俗区隔,分别喜欢传统戏曲和流行音乐以及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群体则命名为本土杂食者和海外杂食者。最后一个群体喜欢所有三种音乐类型,命名为杂食者。

表1 文化品味的类型与文化杂食的操作化测量

	品味类型	喜欢的音乐类型	文化杂食 (原始定义)	文化杂食(加入 通俗品味者)	文化杂食 (计数法)
1	文化疏离者	—	—	—	0
2	通俗品味者	流行	—	—	—
3	本土高雅单食者	戏曲	—	—	1
4	海外高雅单食者	古典	单食者	单食者	—
5	高雅单食者	戏曲、古典	—	—	—
6	本土杂食者	戏曲、流行	—	—	2
7	海外杂食者	古典、流行	杂食者	杂食者	—
8	杂食者	戏曲、古典、流行	—	—	3

在彼得森等人最初的文化杂食定义中,杂食者首先必须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Peterson & Kern, 1996)。因此,在分析时只需考虑上述第3至8类人群。其中,6~8为杂食者,3~5为单食者。而如果考虑后续的概念发展(Peterson & Rossman, 2007),将文化品味的层级和广度区分开来,则2~5均构成单食者,6~8仍为杂食者。上述均是文化杂食的构成定义,在采用量的定义也即计数法(Rossman & Peterson, 2015)的情况下,受访者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即代表其音乐品味的杂食程度。当然,由于跨年可比音乐类型仅有3个,音乐品味杂食的计数法测量取值范围在0~3之间。考虑到文化杂食不同操作化测量的变量性质,本文将使用逻辑斯蒂回归和泊松回归等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

2. 控制变量

为控制杂食者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学特征,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男=0,女=1)、年龄及其平方项、受教育年限、取对数的个人年收入、职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1,私营企业主与高级管理人员=2,专业技术人员=3,一般职员=4,个体工商户/自雇者=5,商业与服务业劳动者=6,产业工人=7,农业劳动

者=8,在校学生=9,从未工作=10)、所在地区(东部=1,中部=2,西部=3),以及调查年份(1999年=1,2008年=2,2023年=3)等。

四、研究结果

(一)中国城市居民文化杂食水平的变迁

表2是对各类音乐品味群体变化的描述统计。不难看出,文化疏离者、本土高雅单食者和海外高雅单食者的占比一直在下降。本土杂食者和杂食者的占比则有所提升。这似乎表明,人们对各类文化形式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开放。特别是,完全不喜欢任何音乐类型的文化疏离人群一直在减少,表明音乐在中国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此外,通俗品位者的占比在1999—2008年迅速提高,之后平稳增长。

表2 各文化品味类型人群的分布及变迁

年份	文化疏离者	通俗品味者	本土高雅单食者	海外高雅单食者	高雅单食者	本土杂食者	海外杂食者	杂食者
1999	19.95%	17.27%	30.28%	3.94%	4.45%	11.53%	7.72%	4.87%
2008	15.34%	25.00%	18.72%	2.20%	2.74%	15.67%	10.41%	9.92%
2023	11.47%	26.27%	13.93%	1.16%	3.63%	22.79%	6.24%	14.51%
全样本	17.77%	20.38%	25.32%	3.16%	3.88%	13.87%	8.32%	7.30%

表3呈现了不同操作化测量下中国城市居民音乐品味杂食的情况及其变迁。不难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操作化测量,中国城市居民音乐品味的杂食水平都有所提升,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也在增加。需要指出的是,表3中杂食者的占比远高于已有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一方面是因为本文参考彼得森等人(Peterson & Simkus, 1992; Peterson & Kern, 1996)的操作化方法,在分析中舍弃了文化疏离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本文可用数据中音乐类型的数量较少,杂食品味的条件较易满足,容易高估杂食者的比例。若考虑文化疏离者,杂食者的占比将有所下降(表3第4列)。尽管如此,相关数字仍然存在高估的可能,但中国城市居民音乐品味杂食水平的一般变迁趋势已经较为明晰。

表3 不同操作化测量下中国城市居民杂食品味的变迁

年份	文化杂食 (原始定义)	文化杂食 (加入通俗品味者)	文化杂食 (加入文化疏离者)	文化杂食 (计数法)
1999	38.43%	30.14%	24.13%	1.14
2008	60.34%	42.52%	36.00%	1.33
2023	69.93%	49.18%	43.54%	1.50
全样本	47.68%	35.86%	29.49%	1.23

中国城市居民音乐品味杂食相关因素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显示,无论使用何种操作化测量,相较于1999年,2008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居民的音乐杂食水平都更高。在文化杂食的原始定义下,2008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居民成为杂食者的发生比分别较1999年高68.40% ($e^{0.521}-1$)和145.42% ($e^{0.898}-1$),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则分别要多8.18% ($e^{0.079}-1$)和17.20% ($e^{0.159}-1$)。以2008年为参照组,2023年时中国城市居民成为杂食者的发生比是2008年时的1.46倍 ($\beta=0.377, SE=0.084, p<0.001$),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则要多8.34% ($\beta=0.080, SE=0.002, p<0.001$)。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杂食水平一直在提高,越来越倾向于跨越高雅与通俗的区隔,欣赏不同音乐类型。

表4 中国城市居民音乐品味杂食的逻辑斯蒂回归和泊松回归分析

	模型 I :文化杂食 (原始定义)-逻辑斯 蒂回归	模型 II :文化杂食 (加入通俗品味者)- 逻辑斯蒂回归	模型 III :文化杂食 (计数法)-泊松回归
性别(女=1)	0.216* (0.086)	0.192*** (0.038)	0.056*** (0.013)
年龄	-0.158* (0.062)	0.001 (0.027)	-0.014* (0.006)
年龄平方项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受教育年限	0.019 (0.025)	0.022 (0.022)	0.014*** (0.003)
年收入(对数)	0.018 (0.011)	0.017*** (0.005)	0.001 (0.002)
职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1)			
私营企业主与高级管理人员	-0.128 (0.105)	0.031 (0.239)	0.026 (0.095)
专业技术人员	-0.388* (0.179)	-0.116 (0.225)	-0.008 (0.047)
一般职员	-0.176 (0.129)	-0.095 (0.119)	-0.010 (0.011)
个体工商户/自雇者	-0.267 (0.248)	-0.224 (0.228)	-0.088* (0.041)
商业与服务劳动者	-0.003 (0.185)	-0.063 (0.226)	-0.032 (0.049)
产业工人	-0.280** (0.088)	-0.313** (0.121)	-0.095** (0.032)

(续表4)

	模型Ⅰ:文化杂食 (原始定义)-逻辑斯 蒂回归	模型Ⅱ:文化杂食 (加入通俗品味者)- 逻辑斯蒂回归	模型Ⅲ:文化杂食 (计数法)-泊松回归
农业劳动者	-0.417*** (0.061)	-0.007 (0.088)	-0.001 (0.016)
在校学生	0.202 (0.192)	0.016 (0.255)	-0.073*** (0.016)
从未工作	-0.443 (0.346)	-0.538 (0.345)	-0.159** (0.054)
居住地区(东部=1)			
中部	0.069 (0.062)	0.048 (0.146)	0.012 (0.031)
西部	-0.145 (0.186)	-0.141 (0.160)	-0.057* (0.025)
年份(1999年=1)			
2008年	0.521*** (0.025)	0.255*** (0.066)	0.079*** (0.015)
2023年	0.898*** (0.067)	0.439*** (0.047)	0.159*** (0.013)
常数项	5.083* (2.049)	-0.249 (1.205)	0.509* (0.238)
样本量	4094	5443	6619
Pseudo R^2	0.246	0.071	0.017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括号内为年份聚类稳健标准误)。

文化杂食者也表现出一些社会-人口学特点。女性居民更有可能成为杂食者,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也更多。这与现有研究中文化消费“女性化”(feminization)的观察相符(DiMaggio & Mukhtar, 2004; Katz-Gerro, 2002; Purhonen et al., 2011)。另外,社会经济地位与杂食品味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但缺乏统一的模式。在纳入通俗品味者对杂食性进行测量的情况下,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可能成为杂食者;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越多。这与大多数既有研究的结果吻合。在职业地位方面,相较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产业工人的杂食水平更低,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更少。

彼得森的文化杂食定义并未考虑那些不喜欢任何音乐类型的文化疏离者(Brisson, 2019)。将这一群体纳入分析可能会对本文的主要结果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将文化疏离者、通俗品味者、高雅单食者和高雅杂食者视作四种品味模式,使用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中国城市居民音乐品味模式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拟合。结果显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未受到影响。^①

① 篇幅所限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相关结果。

(二)文化杂食转向的社会过程

文化杂食转向的发生可能源于不同的社会过程。为探讨中国社会文化杂食水平提升的具体动态机制,本文以2008年为参照组,在10个职业群体子样本中对中国城市居民音乐杂食水平进行了回归,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到,无论采用何种文化杂食的操作化测量,1999年至2023年,产业工人的杂食水平显著提升;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自雇者的文化杂食水平在1999—2008年有所提升,但2008年与2023年的差异并不显著;一般职员的文化杂食水平则在2008—2023年显著提升。在考虑通俗品味者和计数法的文化杂食定义下,商业与服务业劳动者的杂食水平同样在20多年间显著提升。私营企业主与高级管理人员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在20多年间也持续提升,但其杂食程度在两种构成的定义下却缺乏相对一致的变化模式。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农业劳动者、在校学生和从未工作过的群体同样未展现出统一的变迁趋势,部分群体的杂食程度在2008—2023年甚至有所下降。这实际上揭示了不同于彼得森的另一条路径,即中国社会文化杂食水平的提升不是因为较高社会阶层变得更加开放宽容,而是因为社会中相当数量的阶层都拥有了更多文化消费选择,文化品味由此变得更为杂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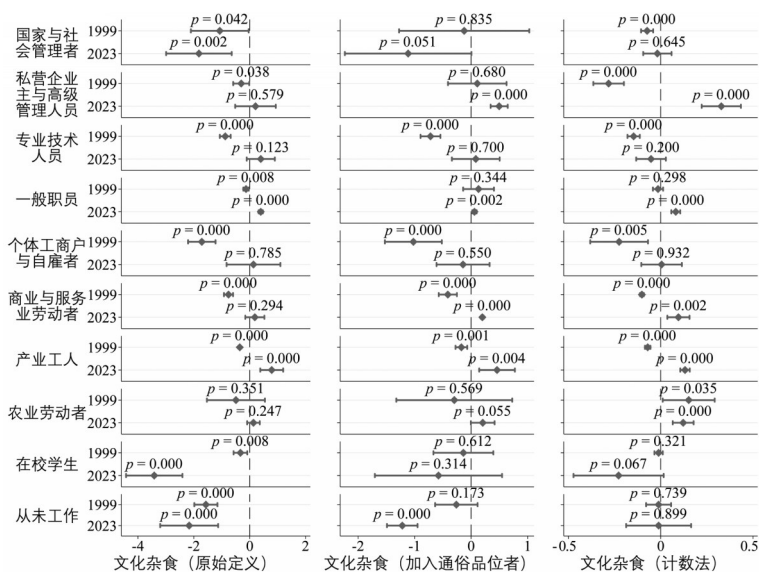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职业群体文化杂食水平的历时变迁

在杂食水平有所提升的职业群体中,各音乐类型受欢迎程度的变迁趋势如图3所示。可以看到,在1999—2023年,几乎所有职业阶层对流行音乐的喜爱程度都有所增加。2023年,私营企业主与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一般职员和商业与服务业劳动者中喜爱流行音乐者的占比都接近或超过80%,而在1999年,私营企业主与高级管理人员中喜爱流行音乐者甚至还不到30%。这表明流行音乐听众在各社会阶层中的扩展或许是中国社会杂食水平增长的主要动力。相较之下,各职业阶层中喜欢古典音乐和传统戏曲者的占比变化较小,喜欢传统戏曲者的占比仅在私营企业主与高级管理人员中有较大提升,而喜欢古典音乐者的占比在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职员中甚至有所下降。这也与表2展示的趋势相符。在高雅音乐类型喜爱者占比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全社会杂食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通俗音乐在各社会阶层中被广泛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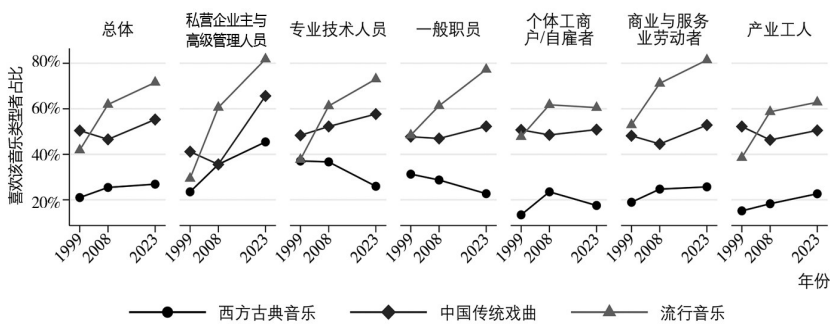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职业群体对各音乐类型喜爱程度的历时变化

五、总结与讨论

使用横跨1999—2023年的三份数据,本文对中国社会中文化杂食现象的历时变迁及其变化机制做了探索性分析。结果显示,1999—2023年间,无论使用何种操作化测量,以音乐品味衡量的中国城市居民文化杂食水平一直在稳步提升。不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我国文化杂食转向的发生更有可能是社会各阶层获得更多文化消费选择、文化品味变得多样化的结果。

这一结果对文化品味研究或有一定的启示。一方面,从文化品味与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经典议题看,文化杂食的概念或许因其为社会较高阶层

赋予了开放包容的形象而颇受重视。然而,本研究揭示了文化杂食转向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文化杂食程度的提升并不一定是社会上层变得更加开放包容、从势利转向杂食的结果,也可能源于社会各阶层获得了更多文化消费选择,进而扩展了相应的文化品味。与此同时,本文并未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发现文化品味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统一的关联模式。因此,如果文化杂食并不意味着文化态度更加开放宽容,也不是社会较高阶层特有的品味模式,其作为一种品味模式还能在多大意义上被视作社会地位的标识,在社会结构再生产中还能发挥何种作用就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话题。更进一步,在中国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是否展现出了不同的品味模式,文化品味与社会结构再生产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其如何参与到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中,与其他社会相比又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都仍有待讨论。在布迪厄看来,文化品味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其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机制(Bourdieu, 1984)。然而,中国社会的阶层再生产机制有其特殊性,这也使得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品味对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作用较为有限(胡安宁,2017,2021,2023;李煜,2001;田丰、杨张韞宇,2019)。受数据限制,文化品味能在地位获得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资本等话题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但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未来的研究深入探索。

另一方面,从跨国比较的层面看,本研究得到的结果还表明,在类似的社会变迁条件下,文化品味的转变受到历史背景的制约。彼得森等人认为,美国民众生活水平提高、高等教育扩张、大众媒体对多元文化的呈现、阶层流动与人口迁移、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等外生社会变迁因素(Peterson & Kern, 1996),以及传播介质从CD向互联网音乐平台转变等音乐产业内生变化因素(Rossman & Peterson, 2015),使美国公众音乐品味的杂食性在1982—2008年呈现出倒U形趋势。在1999—2023年,中国社会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包括自1999年开启的高等教育扩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阶层流动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及音乐传播方式的变化等。但在类似的社会变迁条件下,我国城市居民音乐品味的杂食性却不断增强,对各种音乐类型的偏好程度也有所提升。这表明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转型过程对音乐品味模式的变迁有重要影响。在经历长期的经济匮乏后,现代化与全球化交织的社会转型过程为社会各阶层居民提供了多样的文化消费选择,培养了杂食品味,同样经历了社会变迁,中国和西方社会的

文化杂食水平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可见,对文化品味历时变化的考察不应脱离特定社会的历史背景。

文化杂食的历时和跨国比较研究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例如不同时期调查执行情况的差异、音乐类型合法性随时代的变化、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本土音乐类型等,但这些限制不应阻碍学界做出相应的探索与尝试。本文并不能解决所有关于文化杂食的争论,数据的限制也使得对本文结论的外推要十分谨慎,但这一探索向我们揭示了继续探究中国社会文化杂食现象的必要性。下述未尽议题涉及本文的一些不足,也值得未来的研究继续深入和拓展。

首先,完善大型社会调查对居民文化品味的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均有定期的、跨年相对可比的文化品味与文化参与调查,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积累仍相对不足。未来应当注重开展定期调查,收集文化品味与消费历时变化的数据。特别是,针对学界关于音乐能否代表诸如文学、视觉艺术和电影等其他文化形式,是否具有可推广性(Meuleman & Savage, 2013; Nault et al., 2021; Peterson, 2005; Purhonen et al., 2011; Warde et al., 2007),以及过于泛化的音乐类型题器可能仅反映了类型间(between-genre)的区别而忽视了类型内(within-genre)的差异(例如传统戏曲内部京剧、昆曲和地方戏的区别)(Brisson, 2019; Goldberg et al., 2016; Holt, 1997; Nault et al., 2021)等问题,未来的文化品味调查可以从音乐向更多文化形式扩展,并细化文化品味调查题器的颗粒度,考察居民对特定文化子类型(sub-genre)、艺术家和作品的偏好。此外,文化品味调查还应考虑为跨国比较研究积攒可用的经验资料。只有通过跨国比较,中国的文化品味研究才有可能为相关争论提供新的经验与视角。

其次,利用社会科学新方法手段探讨文化杂食话题。本文尝试使用词向量方法对音乐类型的合法性进行了测量,这一方法也可以被扩展到测量具体作品和艺术家的文化合法性上,还可以解决不同文化类型的合法性内生地变迁的问题。此外,研究者还可以利用在线实验、问卷实验等因果推断方法,探讨长期困扰文化杂食研究的研究方法争论,比如音乐品味题器的措辞、数量、位置是否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等(Brisson, 2019; Peterson, 2005)。另外,针对问卷调查反映真实态度与行为的质疑,研究者还可以利用计算社会科学手段,使用网络评分、支付数据等探讨居民真实的文化品味

(评价)和消费行为。

最后,通过质性方法扩展文化杂食研究。既有文化杂食研究大多使用量化方法展开,但不可否认的是,质性方法能为解决文化杂食研究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争论提供更大帮助。在理论层面,文化杂食的概念实际上蕴含着“弱解释”(weak interpretations)和“强解释”(strong interpretations)两个层次(De Vries & Reeves, 2022)。“弱解释”的文化杂食意味着个体喜欢的音乐类型数量较多且跨越了高雅-通俗的区隔(但他们仍然有可能以势利的眼光看待特定的文化类型)。“强解释”则进一步强调杂食者要拥有包容的心态,对一切事物持开放态度,不会系统性地排斥某种具有阶层或身份属性的文化类型(Peterson & Kern, 1996: 904)。因此,在秉持“强解释”,认为文化杂食暗含了开放宽容的属性的情况下,就会认为杂食者应反对对势利观念,摒弃基于文化品味的社会排斥。只有通过质性方法,我们才能了解人们如何看待他们不喜欢的文化类型,以及其中是否带有势利排斥态度,甚至发现受访者暗含的基于文化品味的社会排斥本能(Jarress & Friedman, 2017)。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并不知道受访者如何理解大型社会调查中的音乐品味题器,以及这种理解在人群中是否一致。在迅速变迁的中国社会,当受访者说自己喜欢“流行音乐”时,60后可能指的是革命艺术歌曲,80后可能指的是摇滚、民谣等音乐类型,而当代“流行音乐”可能包括我国港台地区乃至欧美的音乐作品。类似的,当受访者表达“喜欢”某种音乐类型时,他可能是把音乐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偶尔在音乐播放软件中欣赏,抑或只是表达听到他人播放时并不反感,甚至是为了迎合文化“合法性”而调整自己的回答,以满足调查者和社会规范的期待(Coulangeon & Lemel, 2007; Peterson, 2005)。可见,对文化品味的量化考察还存在许多未被明确言说且容易被忽视的预设,这都有待质性研究的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范国周、张敦福, 2019,《文化消费与社会结构:基于CGSS2013数据的多元对应分析》,《社会科学》第8期。
- 盖格尔,海因利希, 2013,《枝繁叶茂: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刘经树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 胡安宁, 2017,《文化资本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第1期。
- , 2021,《文化资本:何以文化,何以资本?——理论辨析与未尽议题》,《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期。
- , 2023,《作为文化资本的传统:以古典文学名著为例》,《复旦教育论坛》第6期。
- 李煜, 2001,《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林晓珊, 2017,《谁人爱读书:一项文化消费的阶级比较研究》,《山东社会科学》第10期。
- 卢文超, 2021,《理查德·彼得森的文化杂食观念及其论争》,《文艺争鸣》第4期。
- 孙宇凡, 2022,《品味区分、享乐欲望与亲密关系:当代消费社会学三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3期。
- 田丰、杨张韞宇, 2019,《钢琴无用:上海中产阶层家长的文化资本培养策略》,《中国研究》第2期。
- 王宁, 2017,《音乐消费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基于85后大学(毕业)生的外国流行音乐消费的质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第10期。
- 于佳媛, 2017,《广场舞参与者的品位分层研究——以上海市中心城区广场舞群体为例》,《中国研究》第1期。
- 朱迪, 2017,《高雅品味还是杂食?——特大城市居民文化区分实证研究》,《山东社会科学》第10期。
- Atkinson, Will. 2011. "The Context and Genesis of Musical Tastes: Omnivorousness Debunked, Bourdieu Buttressed." *Poetics* 39(3).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6.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 Loïc J.D.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risson, Romain. 2019. "Back to the Original Omnivore: On the Artefactual Nature of Peterson's Thesis of Omnivorousness." *Poetics* 76.
- Chan, Tak Wing & John H. Goldthorpe. 2006.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Music in England."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1).
- . 2007.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The Visual Arts in England." *Poetics* 35 (2-3).
- Coulangeon, Philippe & Yannick Lemel. 2007. "Is 'Distinction' Really Outdated? Questioning the Meaning of the Omnivorization of Musical Taste in Contemporary France." *Poetics* 35(2-3).
- De Vries, Robert & Aaron Reeves. 2022.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Cultural Omnivore? Conflicting Visions of Omnivorousness in Empiric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7(2).
- DiMaggio, Paul & Michael Useem. 1978. "Social Class and Arts Consumption: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Class Differences in Exposure to the Arts in America." *Theory and Society* 5(2).
- DiMaggio, Paul & Toqir Mukhtar. 2004. "Arts Participation as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2-2002: Signs of Decline?" *Poetics* 32(2).
- Du, Shichao. 2022. "Global Exposure: An Alternative Pathway to Understanding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9(1).
- Goldberg, Amir, Michael T. Hannan & Balázs Kovács. 2016. "What Does It Mean to Span Cultural Boundaries? Variety and Atypicality in Cultural Consump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2).
- Gayo, Modesto. 2016. "A Critique of the Omnivore: From the Origin of the Idea of Omnivorousness to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In L. Hanquinet & M. Savage (eds.),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Art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Hazır, Irmak Karademir & Alan Warde. 2016. "The Cultural Omnivore Thesis: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the Debate." In L. Hanquinet & M. Savage (eds.),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Art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Holt, Douglas B. 1997. "Distinction in America? Recovering Bourdieu's Theory of Tastes from Its Critics." *Poetics* 25(2-3).
- Jarness, Vegard & Sam Friedman. 2017. "'I'm Not a Snob, But...': Class Boundaries and the

Downplaying of Difference.” *Poetics* 61.

Katz-Gerro, Tally. 2002. “Highbrow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Class Distinction in Italy, Israel, West Germany,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81(1).

Kozłowski, Austin C., Matt Taddy & James A. Evans. 2019. “The Geometry of Culture: Analyzing the Meanings of Class through Word Embedding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5).

Li, Gordon C. 2021. “From Parvenu to ‘Highbrow’ Tastes: The Ris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China’s Intergenerational Elit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2(3).

Lizardo, Omar & Sara Skiles. 2012. “Reconceptualizing and Theorizing ‘Omnivorousness’ Genetic and Relational Mechanisms.” *Sociological Theory* 30(4).

———. 2015. “Musical Taste and Patterns of Symbolic Exclu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3–2012: Dynamics of Continuity and Differentiation across Generations.” *Poetics* 53.

López-Sintas, Jordi & Ercilia García-Álvarez. 2002. “Omnivores Show Up Again: The Segmentation of Cultural Consumers in Spanish Social Spac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3).

———. 2004. “Omnivore Versus Univore Consumption and Its Symbolic Properties: Evidence from Spaniards’ Performing Arts Attendance.” *Poetics* 32(6).

Ma, Xiangyu. 2021. “What Are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Taste?” *Poetics* 84.

Meuleman, Roza & Mike Savage. 2013. “A Field Analysis of Cosmopolitan Taste: Lessons from the Netherlands.” *Cultural Sociology* 7(2).

Nault, Jean-François, Shyon Baumann, Clayton Childress & Craig M. Rawlings. 2021. “The Social Positions of Taste between and within Music Genres: From Omnivore to Snob.”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4(3).

Peterson, Richard A. 1992. “Understanding Audience Segmentation: From Elite and Mass to Omnivore and Univore.” *Poetics* 21(4).

———. 2005.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 Example of Omnivorousness.” *Poetics* 33 (5–6).

Peterson, Richard A. & Roger M. Kern. 1996. “Changing Highbrow Taste: From Snob to Omnivo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Peterson, Richard A. & Albert Simkus. 1992. “How Musical Tastes Mark Occupational Status Groups.” In M. Lamont & M. Fournier (eds.), *Cultivating Differences: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terson, Richard A. & Gabriel Rossman. 2007. “Changing Arts Audiences: Capitalizing on Omnivorousness.” In S. J. Tepper & B. Ivey (eds.), *Engaging Art: The Next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s Cultural Life*. London: Routledge.

Purhonen, Semi, Jukka Gronow & Keijo Rahkonen. 2010. “Nordic Democracy of Taste?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in Musical and Literary Taste Preferences in Finland.” *Poetics* 38(3).

———. 2011. “Highbrow Culture in Finland: Knowledge, Taste and Participation.” *Acta Sociologica* 54(4).

Reeves, Aaron. 2016. “Age-Period-Cohort and Cultural Engagement.” In L. Hanquinet & M. Savage (eds.),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Art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Robette, Nicolas & Olivier Roueff. 2014. “An Eclectic Eclecticism: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about the Quantification of Cultural Omnivorism.” *Poetics* 47.

Rossman, Gabriel & Richard A. Peterson. 2015. “The Instability of Omnivorous Cultural Taste Over Time.” *Poetics* 52.

Van Eijck, Koen. 2001.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Musical Taste Patterns.” *Social Forces* 79(3).

Veblen, Thorstein. 2007[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rde, Alan, David Wright & Modesto Gayo-Cal. 2007. "Understanding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Or, the Myth of the Cultural Omnivore." *Cultural Sociology* 1(2).

———. 2008. "The Omnivorous Orientation in the UK." *Poetics* 36(2-3).

Warde, Alan & Modesto Gayo-Cal. 2009. "The Anatomy of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The Case of the United Kingdom." *Poetics* 37(2).

Weber, Max. 1948. "Class, Status, Party." In H. H. Gerth & C.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From Snobs to Cultural Omnivores? A Study on Trends in Cultural Taste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1999–2023)

LI Dongyu

Abstract: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is a key concept in cultural sociology tha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ste and social status. A central debate in early studies on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revolves around the historical shift in Western elites' taste patterns from "snobbery" to "omnivorousness".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tended to overlook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since then. Drawing on three datasets collected between 1999 and 2023, this study uses musical tastes as a case to investigate the patterns and historical trends of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The findings reveal a steady increase in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Unlike the shift from "snobbery" to "omnivorousness" observed in Western societies, this change in China is more likely a result of various social strata gaining access to a wider range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options and expanding their cultural tastes.

Keywords: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taste, musical taste, omnivore

(责任编辑: 骆骁)